

战争原因的“生命力假说”

——评“大战过时论”及其它

王义桅



【摘要】 战争与和平是时代矛盾最极端和最集中的反映。故此，历史上依次出现过三种战争形式，这就是作为经济矛盾延续的战争、作为政治矛盾延续的战争和作为文化/文明矛盾延续的战争。本文试图以国际政治的“生命力假说”来揭示战争的逻辑，认为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与宗教这五大力量（“生命力”）如果不能和谐与持续发展，失去平衡，那么战争的潜在因素就始终存在。

【关键词】 战争 大战过时论 生命力假说

作者小档案

1971年生，江西瑞昌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环境工程学学士、国际关系学博士、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Fox fellow，2000-2001）。研究方向与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合作编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译著《大国政治的悲剧》（合译）、《布什的战争》（合译），出版了专著《战魂：从历史透视未来战争》。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对立，首先是通过战争的手段产生出来的。可以说，战争几乎是同氏族社会同时产生的。”^[1]因此，对战争及其原因的探讨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近乎穷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切领域；至于对国家间战争的探讨更是自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战争比任何其他国际关系方面更受到人们的关注”。^[2]可以说，如果有一条线索系统概括出国际关系演绎史的话，只能是战争与和平，或曰冲突与合作，因为后者都是围绕前者的大背景或大主题而展开的。故此，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就要求对国际关系本身进行研究。^[3]

有鉴于此，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几乎都涉及到战争与和平这一领域，不可避免地在回答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总的说来可概括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认为战争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的特征，因而和平是消极的和不稳定的，认识的视角是从历史中窥视现实。^[4]第二种是理想主义的乐观论，通过未来回溯现实，认为和平可以通过建立在世界政府或其他机构基础上，依靠国际法或集体安全或者实行某种社会制度（如康德讲的共和制）来实现，其所说的是一种积极的、抽象的和平。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式的，介于这两者之间，从现实中推测未来，同时强调了制约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的国内与

国际因素。然而，各种理论都有不少理论上的空白和实践上的盲点，不能完全诠释现实与历史，更不能预测好未来。^[5]

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美国学者约翰·穆勒干脆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明确断言大战已经过时^[6]，试图从这场自古以来就一直力争解答而从未真正解答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大胆地预测了未来的乐观情景。值得注意的是，穆勒出版其书《远离世界末日：大战过时论》正是1989年，是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正在这年，一个日本裔美国学者福山语出惊人——历史已经终结^[7]。令人诧异的是，两大言论同时出自两个美国人之口，出现在冷战结束之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考察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或预言就不能不去分析国际格局及美国地位的变化。

本文将从剖析穆勒及其评论者的“大战过时论”出发，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作一时代诠释，并对冷战后的时代演变趋势作一分析，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时代矛盾最极端和最集中的反映，因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考察也就是对时代矛盾演绎的考察，不应拘泥于一国视角、局限于简单的国际力量对比分析或历史对照分析。

一、关于“大战过时论”

每一场全球性战争的结束都引起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普遍反思。一战、二战结束后都是如此。冷战——这一持续40余年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球性对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束时，自然也引起了世界舆论尤其是得胜者一方深刻的反思。^[8]

早在冷战尾声，历史学家加迪斯首先奏响了这一乐章的第一个强劲音符。^[9]范·艾弗拉承接其分析主题，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战争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使其不再有利

可图而将得以抑制的结论。^[10]这场反思从苏联解体前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所引发的，分析思路较为传统。

约翰·穆勒则不同意上述作者对于战争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即战争偏好的过分强调，他一改传统经济分析式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不再仅仅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角度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从文化角度，站在时代变迁和历史演绎的高度探讨了作为解决人类矛盾选择的大战命运问题，并乐观地给它判了死刑，认为人们的战争观念正日益淡薄，这种战争观念的变化最终决定了战争偏好的变化，使战争作为一种政策从潜意识里变得不可想象和不再可取；战争就如同历史中的决斗与奴隶制命运一样，越来越被证明是“无利可图”乃至“不可想象”的，致使“大战——发达国家间的战争，比如二战或更严重的战争是如此的不可能以致于过时了”。^[11]穆勒的观点受到了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启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卡尔·凯森对穆勒的观点作了精彩评述，认为人们观念的变化缓慢，总是落后于现实，关键在于制度的变化，如经济相互依赖、民主和平论、制度主义等所揭示的。^[12]

尽管两者对大战过时论的阐述有所分歧，但其论证都存在两个基本的空白点：其一，何谓“大战”？作为世界大战之义，说其已过时恐怕更令人信服，至少人们情愿去相信（尤其是人们考虑到核武器的作用），其他意义上的大战就不知其可也；其二，何为“过时”，是永久性的退出历史舞台抑或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对“过时”的提法两者都语焉不详——将“过时”视为一种突变，而对“过时”之后的存在或替代方式置之脑后。^[13]

不仅如此，众多的理论都有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不能说明到底是人（国家）在

制造战争还是战争在塑造人(国家)的问题。^[14]只是从单方面,即从人(国家)作用于战争这一面来分析,过分相信人(国家)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中又过分强调人的理性成分,忽视或无视人的非理性因素作用。^[15]事实上,战争发起者智商往往不及战争的分析者,战争的分析家们怎么能推己及人呢?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私有制与国家因素对现代战争爆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之上的社会经济基础,既规定了战争的动力和内容(为什么打),也以它所提供的物质手段和经济承担力,规定了战争的形式和规模(如何打)。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认识到战争的必然性,不能说明战争的偶然性,其认识有一定局限性,在对战争的解释和预测上都存

在问题。

二、状态·力量·意志:一种分析框架

战争的原因有远因与近因之分,有外因与内因之别,也有偶然性与必然性层面的差异,但其根源一般可从人性(善恶)、国家性(包括民族性。黑格尔就认为,由于国家的“排外性”,“战争不惟是必然的,而且是应然的”^[16])、国际性(突出的是华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强调^[17])、世界性(如世界政府、世界联邦等理论从反面强调的)等四个层次来发掘,消除战争也寄希望于这些属性的规范或改良。冷战结束以后,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分析基本上未能超越传统层次分析法的平面认识窠臼,兹归纳如下。(见表一)

表一,有关战争问题的主体-客体分析法及冷战后的理论表现:

主体 客体	精英(个体单元)		组织(国家 ^[18] 单元)		国际体系(世界单元)		时代 (全球化)
	个人	集团	国内(制度/实力)	国家关系(外交)	世界格局(均势、极)	国际“生命力”	
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 宗教	1、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投机 2、有限战争的诱惑 3、暴力文化作祟 4、人的非理性		1、战争的外部性 ^[19] 2、理性式的预防战争 3、国家间相对实力的错误估计或不符		1、国际无政府状态 2、国际战略失衡 3、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生命力”扭曲或异化		信息缺乏的理性或错误估算/感知
冷战后时代的代表性理论	核和平论(战争的理性解释说)		民主和平论	中国威胁论	单极稳定论	文明冲突论	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

然而,大战过时论企图从纵向视角考察大战的命运问题,对战争本身作了与决斗、奴隶制等的比较研究,在平面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某种立体式的希望。事实上,研究国际政治应该有三个维度。

(见表二)

当然,以上分类只是就各模式的世界观和主要着眼点而言,在现实表现和方法论运用上往往是综合各维度内容,是一种

总括性认识。比如马克思主义虽然归类于时间维度,但其阶级分析是属于空间维度的,其预测式的推理又充满了哲学式未来分析的魅力,因而结合了自身(“生命力”)维度的长处。各维度的区别与联系可概括如下:

——时间维度: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在未来支配下的现实主义属于时间维度的典型。它不仅表现为历史主义的实证分析,更

表二，国际政治研究的三维度：

变量 坐标	世界观	方法论	遵循原则	着眼点	对应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
时间维度	科学	阐释性 (历史式溯因法)	连续性 原则 (一体化)	状态 (国内 / 国际)	理想主义 / 经典现实主义
				社会存在 (社会进化)	马克思主义 英国学派 国际政治经济学
空间维度	艺术	描述性 (现状式经济分析)	自由原则 (分散化)	结构(力量)	结构现实主义
				过程(制度)	新自由制度主义
自身(“生命力”)维度	生命	预测、规范性 (哲学式未来分析、 价值分析)	相容原则 和谐原则	认知(意志)	批评理论
				“生命力”	国际政治的 “生命力假说”

关注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演绎与协调，着眼于一体化的矛盾分析。对应战争原因研究，罗伯特·鲍威尔就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在于状态（历史形成的现状）与权力分配（决定未来因素的力量）的差异性作用：“当利益的状况分布与权力分配的差距变得很大时，至少有一个国家就情愿使用武力来推翻现状；而且，这种差距越大，战争的可能性通常也就越大。”^[20]

——空间维度：这是当今最活跃的研究视角，它从国际关系权力的自由度、国际格局、国际力量结构与国际秩序等出发来观察和思考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历史，着眼于全球化的矛盾，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规范分析。例如英尼斯·克劳德在《权力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按权力的集散度分析了国际关系力量三个与权力控制有关的基本概念：均势、集体安全和世界政府，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21]除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外，国际周期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等都是从空间维度研究国际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战争原因的结构解释即是这方面的例证。

[22]

——自身纬度：即国际政治概念具有

状态—力量—意志三种演绎形态，分别对应了历史—现状—未来的时间演绎律。^[23]比如外交，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外交有三种使命：自延（self-extension）、自保（self-preservation）、自制（self-abnegation），分别就力量（自延）、状态（自保）、意志（自制）三个层面反映了外交的演绎形态。^[24]国家概念也一样，领土（部分还包括人口因素）是状态层面，人口（部分包括政府因素）是力量层次，政府与主权是意志层面。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就是从国际关系的主体作用于客体（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正相反）这一理念出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因而是一种革命性的飞跃。本文倡导的国际政治“生命力假说”就试图结合国际政治的主体与客体，从自身维度研究国际关系，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自身维度的研究侧重于哲学、文化式分析的演绎，而非传统经验式的历史归纳。

与其他国际关系研究相似，以往的战争研究也主要从时间维度（纵向）或空间维度（横向）分析，比较缺乏对战争本身的考察。对战争的研究往往与军事等同起来或纠缠在一起[如军事技术革命（RMA）重要性的强调]，或顶多把战争视

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认识。从本质上说,军事是一种“生命力”,而战争是一种现象,或一种“游戏”(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研究了“文化的游戏因素”,把战争当作人类游戏的一种来加以考察,其目的“不是确定游戏在所有其他文化表现中的地位,而是要查明文化本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游戏的特征”,^[25]发人深思)。

大战过时论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它是从战争这一特殊现象本身出发来阐释战争的命运问题,尽管它也避免不了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传统西方思维的误区,仍然没能摆脱太理性化的倾向。

由此可见,分析大战过时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战本身,一般说的大战不仅指其规模、强度,更指其影响。^[26]由此看来,大战有三种方式:大国之间及其同盟或其他国家一起卷入的直接军事对抗,大国在某一地区进行的重大地缘、资源或其他利益争夺战(往往与地区强国交锋),地区强国间的战争但背后有大国的支持;二是过时的概念理解。依我看,过时有三种基本含义:

——状态:即战争的目的过时,不能成为改变既有状态的方式。另外,状态层面还包括作为战争原因的状态性因素如领

土、人口、资源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再在战争原因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涵义。从状态层面说,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是对大战过时论的有力支持。

——力量:战争的功能衰退,不再成为摩根索所说的获得威权、维护或保持威权与显示威权的手段。^[27]O. F. K. 奥根斯基和杰西克·库格勒的“权力转移说”把战争发生的一般原因归于系统结构变化,也是从力量上说明战争演化的趋势与必然性的代表性理论。^[28]作为过时的应有之义,传统均势、联盟等将不再在战争原因上扮演重要角色。从力量层面说,单极稳定论是对大战过时论的极好支持。

——意志:即战争作为一种理念不再具有合法性或不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民主和平论为其有力支持。近年流行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主旨的人道主义干预论就已表明战争观念上的困境:人们已越来越不倾向接受战争这一现实,于是战争发起者非得找到与战争目的完全相反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侵犯人权、践踏主权时却以维护人权为幌。

综上所述,对大战过时论可做如下剖析。(见表三)

表三,大战过时论与战争与和平的演化:

内视 外观	战争载体	战争手段(功能)	战争环境
行为主体	国际体系	战争发起者(国家)	人
外部表征	战争惰性	战争偏好	战争观念
演变趋势	战争否定	战争隐化(退化)	战争遗忘
对应和平	表观和平	中观和平	内在和平

在评述大战过时论时我们不应忘记,它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就在这一理论提出后不到两年,面对两极格局的消失,美国成了仅存的超级大国,现实主义评论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旋即认定,前所未有的美国权力“单极时刻”已经到来。^[29]在冷

战结束后的第10年,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威廉·沃尔弗斯进而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单极世界的稳定性》一文,提出“单极稳定论”,认为冷战后时代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这种单极世界是和平的、持久的,因而是稳定的。^[30]沃尔弗斯立论以威

胁的口吻威慑可能的挑战者，以安抚的姿态说服“搭便车”者，从现实主义角度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大战过时论的理想情结。

1899年，人们普遍认为人人都在变得非常富有，技术非常先进，世界经济紧密交织，因此20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历史开了个戏剧性的玩笑，20世纪却是世界大战和核对抗的世纪，人类毁灭的阴影第一次在人们的心中徘徊。1999年，人们又提出了单极稳定论的想法，就再次表明了这一事实：历史的规律虽然一再在演绎甚至重复，但人们总是善于遗忘过去，并且倾向于幻想未来的。

三、战争的“生命力假说”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战争是氏族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政治社会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战争与和平是时代矛盾最极端和最集中的反映。据此，历史上依次出现过三种战争形式：

1. 作为经济矛盾延续的战争。这一阶段的战争只有一个目的，即争夺生存活动的自然地域作必要的前提，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可言；也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可供别人掠夺。土地是纯粹的天然存在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31]其后，人类以连年战乱的血的代价找到了经济交往这一和平竞争方式，冲突中孕育出合作，零和博弈派生出正和博弈。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经济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32]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交往代替战争成为谋求各国利益和发展的主要手段，故而有“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之说。^[33]但作为国家间的经济矛盾仍然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因素，如海湾战争所显示的。尤其是，在霸权体系下，“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手段”（沃勒斯坦语）^[34]这

样，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这一单极世界里，战争怎么可能不会成为这一选择？

2. 作为政治矛盾继续的战争：“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手段的实现。”^[35]这是文明时代最常见的战争类型。在核时代，政治（外交）似乎又成为战争矛盾的继续，如古巴导弹危机所展示的。

3. 作为文化/文明矛盾继续的战争，如“文明的冲突”及历史上出现的“十字军东征”。如果说后者仍有打着宗教旗帜行政治野心之实，“文明的冲突”则完全是一种未来的战争形态，反映了时代演化的逻辑。

总之，战争作为经济、政治资源再分配的手段和作为文化扩张的工具，在人类历史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应地，研究战争问题也有三个视角：

1. 经济社会视角：从时间维度出发、着眼于历史。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就是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冲突与战争这一视角的代表。^[36]这一类型的战争往往是人-自然关系紧张所导致的战争，如资源战、环境战。

2. 政治军事视角：从空间维度出发、着眼于现实。如范·艾弗拉曾批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摩根索、华尔兹为代表）只注重总的力量，不注重力量的具体形式和结构；只注重总的力量对比（均势、权力），不能提出有效的处方，并用“进攻-防御”关系的变化来解释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当进攻、防御能力趋于平衡时，越不容易发生战争；反之，进攻越强，防御越弱，则越容易发生战争（进攻与防御能力不只局限于军事，还包括地理条件、外交、政治等）。结论是：进攻容易被相信为比较容易，战争的可能性增加；越有机会进攻或被认为有机会进攻，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增

加。^[37]这一类型的战争往往是人 - 社会关系紧张所导致的战争,如源于精英对社会的控制及民众对社会的反抗所导致的战争。

3. 宗教文化视角:这一类型的战争往往是源于人 - 人关系紧张而爆发的战争,如种族、民族冲突、文明的冲突、心理战、意识形态战、源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战争等等。穆勒之所谓“大战过时论”正是就这种战争而言,因而是一种前瞻性认识。

战争的逻辑更由国际政治的“生命力假说”所揭示。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与宗教这五大力量(“生命力”)如果不能和谐与持续发展,失去平衡,那么战争的潜在因素就始终存在。这就是战争的“生命力假说”之要旨,它揭示了战争的必然性。苏联的解体是这一规律的极好印证;当今朝鲜核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是朝国内经济、军事发展极不平衡所导致的外溢效应。伊拉克战争更是战争原因生命力假说从传统经济、政治原因向文化、宗教过渡的重要标志。昆西·赖特曾指出,“并不存在战争的单一原因,和平乃是许多力量的平衡。”^[38]这也正好说明战争的根源在于未来的矛盾演绎而非历史的简单重复或延续。因此,一切通过历史预知未来的做法即是在重复着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正如事物发展和国际关系(矛盾)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一样,五大力量之间也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发展之中,一旦这种失衡不能为国内体制(包括精英与领导人、集团或组织、国家结构或社会体系)或国际体系(包括国际力量与结构)所包容,在偶然性因素(这种偶然性因素还包括人的非理性因素、突发的历史性事件等)的激发或催化下,战争就会成为不可抑制的状态(冲突)、力量(对抗)乃至意志(战争理念),其情形犹如蒸锅烧水,开水的冲力与锅盖的压力成为矛盾的双方,一旦冲力突破压力的控制,战争之水将会四溅如飞。

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德国、日本的经济力远远超出其政治力和文化力,于是军事力成为其经济力拓展的手段,在国内政治体制不能对此加以有效约束和世界存在国际(生命)力非和谐发展的情形下,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已经取得霸权或既得权益的大国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大国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者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不能取得大致平衡,则未必能长久保持它的地位。”^[39]于是,大国的兴衰往往成为大战的肇始,正如国际周期战争论所揭示的。^[40]

在20世纪初,世界在一战结束后的10年中发生了大恐慌,经济急剧下滑,其间接原因是:“当时推行的全球化经济从民族主义的政治发生了冲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人士语)。今天,世界仍将在经济和政治不协调的状况下掀开历史新篇章。因此,大战过时论只是一厢情愿的理念。

生命力的相互作用最终呈现出状态 - 力量 - 意志三种演绎形态,依次递进,反映出历史 - 现状 - 未来关系的演化。这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件,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力的产物。”^[41]

四、结论与启示

“大战过时论”者绝不乏理论勇气,然而其命运与“历史的终结”一样,避免不了落入未来笑柄的境地。当然,它毕竟道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战争的原因在于未来而非历史,因此一切通过历史预知未来的做法都是十分荒谬的。而且,人在

制造战争，战争更在塑造着人；为战争塑造过的人再从事战争，这种战争就不再是过去的战争了。对战争问题的把握也就要求对时代矛盾的准确把握，因而是前进中的、没有先例可以完全推导出，它在于未来的演变。在战争研究上光归纳是不够的，我们缺乏的是演绎、演绎、再演绎。

战争的研究带动了和带动着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由大战过时论而启发的战争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战争的主体和客体上，以一种平面式的眼光看问题，更应考察战争的过程，关注导致战争的偶然因素和支撑偶然因素作用的战争 / 社会系统，对战争自身作深入地研究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观念革新。跳出传统外视法从时间维度（纵向）与空间维度（横向）研究的框框，推崇自身（“生命力”）维度的内视法及内 - 外互视法，便是本文倡导的国际政治“生命力假说”的宗旨。

注释：

[1]杨新富：《古代部落战争研究——战争的起源和演变新探》《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

[2]David V. Edwar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alysi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9, p.179.

[3]传统的微观层次研究的基本推理方法是还原法(reductionism),即以部分的属性和行为来分析和解释整体的属性或行为；本文倡导“反还原法”或“内外互视法”，将部分与整体相结合，即所谓“国际政治‘生命力’假说”。前者可参见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后者参见江洋、王义桅：《国家主权的“生命力假说”》，《欧洲》1998年第5期。

[4]在解释战争原因时现实主义又可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两种，前者如 John Mearsheimer 认为，在多极情况下，战争必然会发生；核武器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有助于和平的很重要因素。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Summer 1990)；后者如 Stephen Van Evera 对国际体系的看法相对乐观一些。他们更多相信国家的理性，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不是稀缺的，而是充足的。可参见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3, Winter 1990/1991.

[5]See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6]John Mu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7]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4, 18.

[8]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9]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4, Spring 1986.

[10]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op.cit..

[11]John Muller, “The Obsolescence of War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ized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3, No.2, Fall, 1988.

[12]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4, No.4, Spring 1990.

[13]德国作家埃森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认为全球存在普遍的

暴力和仇恨，存在着普遍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这可能是国家间战争减少的代价。这就提示我们要去探讨战争“过时”后的替代方式问题。参见 *International Affairs* 70, 4, (1994), p.139。

[14] 扎卡利亚在评述查尔斯·蒂利的话“战争形成国家，国家制造战争”时指出，人们都知道这一名言，但他们似乎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参见 Far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9-40;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2。

[15] 有关战争问题的理性—非理性因素分析，参见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Summer 1995。

[16] 贺麟：《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一书评述》，《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页。

[17] [美] 肯尼思·N·华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8] 对国家性的探讨不应过于一般化和抽象化而忽视国家的个性。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国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战争倾向和态度，民主和平论就强调了民主国家间对战争的拒斥。有学者认为，“有可能引发战争的背景因素包括：(1) 高度服从政治权威的领导阶层和一般人民；(2) 国防部门和工业部门的挂钩；(3) 军备竞赛”。三条战争远因中国家体制就占了两条 (Frederick S. Person & J. Martin Rochester 著，胡祖庆译，《国际关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5页)；另外，有学者对战争原因中的国家因素还作了动态分析，参见 Michael C. Desch, “War and Strong States, Peace and Weak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0, No.2, Spring 1996, pp.237-68。

[19] 战争的外部性是指发动战争的领导人往往享受战争的好处而不承担其代价(代价由士兵与国民来承担)这种情形，由经济的外部性(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概念得到启示。参见：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op.cit. p.379。

[20] Robert Powell, “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orld Politics* 48, January 1996, 99. 239-67。

[21] Inis.L.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22] 战争原因的结构解释包括权力转移、均势、极与战争关系等方面的论述，代表性文献有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R. Harrison Wagner, “Peace, Wa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 September 1994; Seyom Brow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p.71-76 等。

[23] 有关国际政治概念“状态—力量—意志”演绎律论述，参见王义桅：《国家安全的时代变迁与研究困境》，《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

[24]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67-80。

[25] [荷] 胡伊青加著，成穷译：《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章“游戏与战争”。

[26] See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November 1991, pp.833-850。

[27] 参见 [美]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

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一、第二章。

[28] O. F. 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9]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Winter 1990/1991.

[30]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Summer 1999.

[3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175 页。

[32] 转引自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2, March/April 1999.

[33]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4, Spring 1996, pp.5-41.

[3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24, 1983, pp.100-

108.

[35]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36] Raymond Aron, *War and Peace: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37]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Spring 1998.

[38]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351.

[39] [美] 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46 页。

[40] William R. Thompson, "Dehio, Long Cycles, and the Geohistorical Context of Structural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1991, pp.126-152.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 卷，第 478 页。

收稿日期：2003 年 8 月